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学术通讯 ——

2010年5月（总第二十期）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 2010. 5 —

E-mail: ias-fudan@yahoo.cn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 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目 录

一.学术成果	4
1. 顾肃：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理论问题辨析.....	4
2. 顾肃：全球化时代的商业伦理与社会公正.....	4
3. 刘清平：论墨家兼爱观的正当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5
4. 孙国东：《民族想象与文化认同——从〈叶问 2〉说开去》	5
5. 邓正来主编《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第一辑出版.....	6
6. 邓正来：“知识转型”：引进来与走出去——《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序.....	7
7. 克劳斯·迪克 著 林曦 译：德国的纪念文化与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世界性遗产.....	8
8. 王斯福 著 孙国东 译：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	8
9.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春季卷 2010 年 3 月总第 30 期出版.....	9
二.学术讲座	10
1.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转基因主粮与中国的“三农”问题	10
2. 学术名家讲坛：张英进教授主讲“中国电影的跨学科研究”	15
3.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陈志明教授主讲“从海外华人研究谈迁移、本土化与交流”.....	18
4. 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十六期“通业青年讲坛”	20
5. 复旦高研院举办第五期慧园鉴赏会.....	23
三.学术来访	25
1. 悉尼大学来访复旦高研院.....	25
2. 莱斯大学访问高研院.....	25
四.学术出访	26
1. 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母校“川外”六十周年校庆活动	26
2. 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民进中央考察团赴浙江进行“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专题调研.....	27
3. 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都市与族群/民族”研讨会	29
4. 邓正来教授应邀到内蒙古大学讲学.....	29
5. 邓正来教授应邀到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讲学.....	30
五.学术会议	31
1. “东亚协商政治的文化渊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31

2. “生存性智慧”：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会议议程.....35

一.学术成果

1. 顾肃：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理论问题辨析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摘要：社会主义民主与其他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之间的关系，既存在原则性的区别，也有一些共同点。从规范的要求上说，社会主义民主应该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广泛的民主参政议政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包括：选民必须能够自由地、实质性地参与选择，作出决定。一般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应该由党员和民众或其代表从复数候选人中选举产生。提名候选人和选举的过程必须公开、公正、透明，进行广泛的政策辩论，候选人的政见和相关信息充分向公众公开。发展慎议协商民主，以公共理性为标准，通过广泛的协商由党内民主推动全民民主，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慎议民主

2. 顾肃：全球化时代的商业伦理与社会公正

《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

摘要：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工商业活动空前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命运共同体，也使得商业伦理的意义带上全球的性质。分别发生在20世纪末的东亚和2008年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突显了商业信用对于经济秩序的重要性，人为制造的金融泡沫有可能摧毁经济的根基，破坏经济发展的成果，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能受其伤害。同样，实物产品本身的质量和安全性、以及商业广告和交易中的诚信永远是商业伦理首要的因素。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接受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并且致力于克服商业伦理上的诸多问题。强化国际和国内商业诚信，确立普遍贸易准则，实现社会公正，是今天经济全球化中各国政府和民众都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任务。

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bou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the world so closely, that it has made people in the planet a community of common fortune, and business ethic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Financial crises happened respectively in East Asia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and in US and western world in 2008, have given prominence of business credit to economic order. Financial bubbles created by businessmen can damag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ruin achievement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yone, any country can be their victims. Meanwhile, quality and safety of physical products and honesty in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and trade are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in business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economic reform and embrace of globalization, China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many problems in business ethics, and has been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resolve them. Strengthening credit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business, setting up universal rules for trade, achieving social justice, are a task that all the people an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hould face and strive to realize.

3. 刘清平：论墨家兼爱观的正当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第三期

摘要：墨家兼爱观在强调“不可坑人害人，应该爱人助人”的正当原则，主张“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平等观念，提倡“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民主意识等方面，具有儒家仁爱观难以比拟的优势，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克服当代西方权利、平等观念的某些缺陷。因此，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展开中国现代文化理念的创造性研究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从作为“民间小宗教”的墨家那里汲取可贵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墨家；兼爱；正当；平等；民主

On the Implications of Righteousness in the Mohist Conception of “Universal Impartial Love”

Liu Qingping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Mohist conception of “universal impartial love” highlights the ancient precept of righteousness. The Mohist assertion of “harming no one and loving fellow humans” stresses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and endorses the primitive idea of democracy. In these aspects, it not only surpasses the paradoxical Confucian idea of “humane love” in large measure, but also helps us correct some defects in the modern Western ideas of “rights” and “equality”.

Key words: Mohism; universal impartial love; rightness; equality; democracy

4. 孙国东：《民族想象与文化认同——从〈叶问 2〉说开去》
载《人民政协报》2010年5月10日9版(“学术家园”)

摘录：晚近以来，随着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神话”的终结和“中国成功故事”的持续上演，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中国研究领域迅速蔓延开来。从理论上讲，民族主义至少可以区分为：“文化不可替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优越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即萨义德所谓的“变成了盲目崇拜本土的本质和认同”的民族主义）；但只有可以通过普遍主义道德检验的民族主义（即前一种民族主义）才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内获得辩护。以此为起点，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向度简要分析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复杂情势。

首先，就“中国成功故事”而言，我们应该采取理性的态度，要看到我们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但也产生了诸多与社会转型有关的结构性难题。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在根本上是一个向古典传统和社会主义新传统（或计划经济新传统）双重诀别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不仅面临着由社会分化、个性疏离带来的一系列结构性的难题，更在根本上面临着由文化断裂带来的认同危机：在社会层面，个人自主、公共自主、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等同时成为我们的诉求；在个性层面，与“消费社会”的形成相伴而生的个体的原子化与价值观的趋同化，共同造就了一大批“伦理生活”单一化的原子化个体；在文化层面，传统上由儒学道统或社会主义道德型塑的文化认同正面临着根本的挑战。显而易见，即便是我们主张“文化不可替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中国的民

族想象和文化认同本身就是一项历史任务。

5. 邓正来主编《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第一辑出版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

第一辑

邓正来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10年5月第1版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2008-2009）大部分讲演稿的结集。其中收录了马歇尔·萨林斯、周其仁、王国斌、戴维·M.特鲁贝克、童世骏、陈来、王思福、汤一介、邓晓芒、俞吾金、陈嘉映、朱维铮、张文显等15位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精彩演讲。从中可以见出他们就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前沿问题所做的研究和思考。

讲坛简介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设立的常规性品牌论坛之一。该论坛践行“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以崭新的方式加强中国对社会科学前沿理论问题的了解和研究。希望通过邀请世界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名学者进行主讲、评论与提问相结合的讲演，把该讲坛建成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将世界社会科学理论“引进来”的重要平台，也是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整体理论水平、加强实质性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互动平台。

目 录

马歇尔·萨林斯 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与人性

周其仁 货币的教训——美国次贷危机对思想的影响

王国斌 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转型

戴维·M.特鲁贝克 发展型国家与法律秩序：浅析一种发展与法律的新政治经济学

童世骏 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及其规避可能

克劳斯·迪克 德国的纪念文化与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世界性遗产

陈来 情性与礼义——荀子政治哲学的人性公理

约翰·H.杰克逊 变化中的国际法制度：WTO 与中国

王斯福 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

汤一介 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邓晓芒 论“自我”的自欺本质

俞吾金 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前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

陈嘉映 谈谈语言转向

朱维铮 帝制中国的黄昏：满清在 19 世纪

张文显 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以人民法院的改革为基点

6. 邓正来：“知识转型”：引进来与走出去——《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序

邓正来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务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相对明晰的阶段：（1）上溯自 19 世纪并延续至今的“引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并在翻译大量西方社会科学文献的同时，也在中国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2）大体从 1990 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各种中国问题，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3）从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接轨”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我们不仅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初步建构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而且也开始在各个方面同国际“接轨”。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以“引进”、“复制”和“接轨”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科学共同点在于以西方社会科学的判准作为我们知识生产的判准，而在这种判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较深的层面上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中国这 30 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在我看来，乃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各种西方模式和传统模式的束缚，但中国社会科学却仍然深受前苏联、特

别是西方知识的束缚，无法自主地解释当下实践中的中国经验本身。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来说，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帮着西方的先哲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缺失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当下中国的理论关切，“我们”事实上只是相对于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根本的意义上讲，我们在这些年中严重地忽视了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

7. 克劳斯·迪克 著 林曦 译：德国的纪念文化与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世界性遗产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录》（第一辑），商务印书馆，第 121-137 页

导言

耶拿这个小城有很多历史遗迹，其中一处是弗里德里希·席勒避暑山庄之内的花园。在这个花园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张供游人坐的沉重的石桌。在 18、19 世纪之交时，弗里德里希·席勒常与歌德在这个石桌旁聚会。他们谈天、制定计划并写下后来以《讽刺诗》出版的诗篇。席勒出版商于推广该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人类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了解自己的命运。”（“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o mankind than to know its destiny.”）这句话不但是席勒与歌德之间友谊本质的明证，同时，也真实描述了对启蒙运动这一欧洲史上特定时期的自觉和理解。在欧洲，启蒙运动的遗产产生了现代民主宪政、现代文艺、大学自治及造福于民的科学——或者，简而言之，产生了欧洲 19、20 世纪的现代化。

哈勒大学“魏玛及启蒙运动中心”（Weimar and the Enlightenment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Halle）有一个“古典基金会”（Classic Foundation）——弗里德里希·席勒—耶拿大学（the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y of Jena）联手该基金会，共同创立一个称为“启蒙运动实验室”研究系列。在该研究系列中，社科及人文的诸位学者共同合作，以发现那些源于我们可称之为“1800 年魏玛—耶拿事件”的现代化道路。这一个流行词——“1800 年魏玛—耶拿事件”，独一无二地囊括了一批从 1776 年到 1835 年之间在魏玛与耶拿双城中的作家、哲学家、科学家及艺术家。我的演讲将主要介绍到目前为止该研究系列中有关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研究成果。我的一个导向性的问题是：在 2009 年，德国会庆祝席勒诞辰 250 周年。自从 1934 年开始冠以席勒的名字以来，耶拿大学的责任与贡献将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一个政治科学家，我将集中讨论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席勒。我将提出这样一个命题：耶拿大学在聚焦于席勒的政治遗产之时，将拥有一个影响德国纪念文化的独特契机。为了对这一命题展开讨论，我将首先简要介绍一下这种纪念文化。本文的第二部分将转入关于席勒作为政治理论家的讨论。在最后一部分，我将做出一些有关耶拿大学 2009 席勒年方案的结论。

8. 王斯福 著 孙国东 译：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录》（第一辑），商务印书馆，第 187-214 页

任何人要用任何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都迟早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必须也是一名历史学家。此后，不管他是否接受，他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长时段的连续性与伟大的转型都出现在了被称为“中华文明”的事物中。在我作为人类学家的晚期生涯中，我正遭遇着这种挑战。

我的好友兼合作者王铭铭已经向你们展现了他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圈

说”(conception of the three rings): 核心圈(the inner ring), 指的是位于核心的地方性研究(local studies)或者对占据多数地位的族群的研究——亦即费孝通所谓的“乡土中国”; 第二圈则是对中国非汉民族(non-Han peoples)的研究; 第三圈指的是中国学者对外国的研究。这是从中国的文明中心观出发所得出的一种现代“三圈说”。一个更老版本的“三圈说”则是指: 核心圈(第一圈), 由部分被同化或被“开化”的“熟藩”(assimilated or ‘cooked’ barbarians)组成的边缘圈(第二圈), 以及由“生藩”(‘raw’ barbarians)组成的最外圈(第三圈)。

9.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春季卷 2010 年 3 月总第 30 期出版

目 录

- 卷首语: 重新发现中国 邓正来
- 主题研讨: 重新发现中国(五)
- 张小劲 李春峰 “民主”话语的意义变迁: 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为文本的分析
- 韩秀义 无理论: 中国宪法教材编著体例缺陷评价与“新”体例设想
- 白彤东 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反思中国各级教育改革
- 学术专论
- 朱维铮 重考商鞅变法
- 李永晶 知识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与话语分析
- 学术综述
- 沈志华 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冷战国际史”海外研究状况简介
- 海外专论
- 约瑟夫·拉兹 邓正来译 新世界秩序中的个人权利
- 贺伯特·博德 面对亚现代的新约福音
- 论坛: “邓正来新著出版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
- 编者按语
- 邓正来 对哈耶克的一种个殊化研究
- 朱维铮 浅说邓正来二书
- 童世骏 社会主义者也应该重视哈耶克
- 林尚立 自由的难题: 从生命存在到社会存在
- 王铭铭 从邓正来的为学思想到三个“不等于”
- 韦 森 “哈耶克问题”到底是什么?
- 萧功秦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理对发育公民社会的意义
- 郭苏建 哈耶克思想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意义
- 刘 擎 计划与无知
- 姚中秋 作为一种学术典范的邓氏翻译-研究
- 洪 涛 自然乃功成——邓正来先生的哈耶克研究
- 刘清平 能不能从理性的有限推论出正当的自由?
- 吴 炫 理性设计·自发秩序·中国问题
- 罗 岗 哈耶克的真问题
- 苏振华 什么是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

- 任 晓 探究内生秩序
刘建军 哈耶克与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
吴冠军 如何研读思想人物
刘小平 邓氏“哈耶克研究”中的两条线及其启示
孙国东 消极自由：限度与悖论
书评思考
林 曦 历史远未终结 社会主义进行时——读《社会主义转型》
杨晓畅 厚薄之间的“理想图景”——简析邓正来“理想图景”建构中的两种理论取向
邓正来 “知识转型”：引进来与走出去——《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录》序
曹 晋 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
学者诗思
纳日碧力戈 逝者存结构——纪念列维-斯特劳斯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稿约

二.学术讲座

1.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转基因主粮与中国的“三农”问题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七）

2010年4月29日下午2:00,“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七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本期席明纳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开放时代》杂志社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合办，研讨的主题为“转基因主粮与中国的‘三农’问题”。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当代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法政学院副院长文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张文明副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生态与进化系主任卢宝荣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乐天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复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皮妍博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开放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吴重庆教授，《瞭望东方周刊》刘芳记者以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陈润华、刘清平、顾肃、纳日碧力戈、孙国东、林曦、沈映涵参加了本期席明纳。

邓正来教授首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以及本期席明纳活动的由来和目的，然后请吕新雨教授先做二十分钟的发言。与会学者围绕吕教授的发言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基调发言

首先，吕新雨教授从前段时间《三联生活周刊》关于转基因的一篇报道谈起，指出该文充分肯定了转基因作物的优势，通过这种转入基因的技术，“可以给某种作物注入一种靠杂交方式根本无法获得的特性，



所以有人称这是人类作物栽培史上的一场空前革命。”由于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农民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进而过上现代化的轻松的农业生活。（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 574 期）

其次，吕教授指出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是与“三农”问题的解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她主要探讨了中国“三农”问题作为社会存在整体将会与转基因的政策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发生怎样的关联，指出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其背后隐藏着中国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某种城乡断裂的倾向，种种前置于发展的不考虑可能会造成结果的不必然。

再次，吕教授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谈起，指出小农经济的破产很可能导致了贫民窟的蔓延，因为小农经济一旦被消灭，很可能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历史长期积累起来的耕作技术的消亡会导致年轻人回不到乡村，培养出来的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原生种子的多样性和遗传连续性一旦丧失于人手，现代生物技术往往也会随之丧失其基础，城市和乡村一旦彻底断裂将无法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讲，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的未来和美国欧盟的小农场运动关联着整个世界的未来命运。

最后，针对将“新乡土主义”视为乌托邦，吕教授指出今天的小农经济可以获得现代化的发展。针对大家对粮食产量的担忧，吕教授指出小农经济的生产能力是可靠的，“以世界耕地的 7% 养活了世界人口的 21%”。其关于“新乡土主义”的主张有两个要点：其一，不同于用西方市民社会的理论来探讨中国问题，其追问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存在层面上究竟有没有不同以及有何不同。她主要分析了中国和西方社会在城市的城市发展模式、城乡关系、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异同，主张回到城乡互相哺育的传统来讨论问题。其二，其追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能否反思并建构以乡村作为社会主体的境况，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依托乡村社会的存在，避免城乡之间的断裂。

二、有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



皮妍博士指出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弄清楚基因的功能和组合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基因组合（嫁接，杂交），实验和研究的目的性更明确。转基因大米中的 BT 蛋白作为一种原毒素，它可以被某些昆虫例如卷叶螟虫体内的酶活化，随后能够结合在肠道的受体上，造成肠道穿孔。人类和绝大多数动物既没有可以激活原毒素的蛋白酶，也不存在能和 Bt 蛋白特异性结合的受体，所以 Bt 蛋白质对人类不会产生像虫子那样的影响。

卢宝荣教授指明，由于人体胃部的酸性环境和煮熟食物的饮食方式这两点，也保证了人体不会被带有 Bt 蛋白的转基因水稻毒死。一方面，针对人们关于技术超越自然的担忧，卢教授指出关于自然的非自然化，从人类饲养动物开始，已经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变动物的生长方式。辐射育种和太空育种被接受的事实，也间接证明了科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同时帮助人们对新技术全面了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卢教授指出“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在中国巨大人口的压力下始终是相当重



要的，历史上因为灾荒导致粮食严重不足，从而使得社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稳步健全的规划，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其中转基因食品在科学上给了我们一个保障。

吕新雨教授指出其所反对的是运用实验室技术将不同物种（例如 cats with dogs）的基因“嫁接”在一起，重组 DNA 蓝图，使其具有全新的性质。因为这一转基因技术是以非自然化的方式改变了基因的功能，对生活世界的安全存在危害，其造成的扩大化的影响包括：弱化庄稼的优势（poorer crop performance），产生毒副作用，导致过敏反应，危害环境等等。基于此，我们今天所要反思的是农业技术投射及发展的方向，究竟是不是美国的大农场单一方式，为什么？



沈映涵博士一方面追问我们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比如转基因工程的推动，除了发展的要求以外，背后是否有利益的考量这一问题，强调了政策出台过程中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我们需要对科学本身的客观性加以质疑，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绝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客观中立，并且我们也无法具有足够的理性完全了解科学所带来的后果。正如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经济合作组织这些国际权威机构都表示的那样，人工移植外来基因可能令生物产生“非预期后果”，而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足够的科学手段去评估转基因生物及食品可能带来的风险，那么，如果一些我们无法预期的后果出现，应该由谁来对这些可能的后果负责？如果我们今天认为转基因工程可以因减少农药的使用而减少环境污染，那么一旦转基因技术对整个生物链条造成破坏的话，那么从长期来看是否是更大的灾难？

三、转基因技术的影响与三农问题的应对

张乐天教授回顾了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历史，指出近几十年来，农业发展正是谱写了一部技术深化入农业生产的历史，特别是杂交技术对提高水稻的产量和质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目前的杂交稻抗病虫害的能力日益减弱，农民忙碌于对身体有伤害的农药的喷洒，并且对其后果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转基因水稻可以有效提高水稻的抗病能力，这受到农民们的欢迎。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究竟走向何方，这取决于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运用技术的。



刘清平教授指出对于转基因技术，站在农民、开发商、城市居民等等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诉求，公共行政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时候，其背后有信息公开和价值权衡的要求，如果能在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以讨论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利益纠葛和选择差异，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外，技术问题可以从技术本身的研究和创新来解决，就像应对电脑技术的最好选择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杞人忧天和盲目排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到并具体分析这些技术能够在哪些方面，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



文军教授指出：第一，针对转基因生物工程而言，需要在新技术的使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风险之间需要做一个平衡。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背景之下，农业人口数量巨大，农民自身的组织化程度较低，政治的影响力有限，大量运用转基因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构影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第二，在城乡发展和关系的时候，我们预设了城市比农村好，市民比村民好这两个判断，所以主张农村城市化，村民市民化，这需要进行反思的。而就社会整体的发展而言，我们还预设的按照西方的现代性



发展道路来走，我们是能够顺畅的，这一点同样需要反思。同样的，我们是在农村发展预期不佳的情况下，走向城市发展，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先的主题，也是需要反思的。

林曦博士举出《南方周末》安金磊进行有机农业试验的例子证明了逃脱资本化技术化的生产模式是可能，但这是不可复制的。他认为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新乡土主义的基础进行深入地研究。

张文明副教授指出中国农业要遵循内生发展模式，转基因技术对乡村社会，心理结构，经济增长等方面有巨大的影响，这需要学者们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当今农业发展已经相当大地依靠于技术，城市和研究所，种子，化肥，农业因为能提高产量而受到人们地追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环境的因素更需要在学理层面被认真考量。



邓正来指出转基因技术把自然的优胜劣汰规律给打破了，瘟疫，战争，自然灾害日益被人为控制着。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转基因技术为什么使得这么多人担忧？为什么专家的判断不再成为权威？这标志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一种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夹杂着其他的力量，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第二，转基因技术真的是这么中立么？还是背后有市场的力量？技术，资本和市场是否是在某种意义上被隐形地勾连在了一起。我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秩序如何来看？第三，当年的农药技术，现在带来了环境污染，那么，转基因技术是否会带来一些非意图性的后果呢？我们所认为的安全是绝对的么？人的理性是那么充足的么？

四、城乡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模式的完善



吴重庆教授指出，现在必须要重新评估机器大工业、大农场、单一作物式和小农经济、精耕细作式农业发展模式各自的利弊。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其一，在资本的逻辑下，我们不会看到农业的社会和文化的产出。其二，单一作物的种植方式，使得生产地到消费地的运输成本和买卖交易成本急剧增加，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其三，考虑到政府逐渐鼓励土地流转和规模扩大降低成本以

及资本追求增值的本性,那么与高效率技术的降低成本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转基因技术,完全有可能导致小农模式的瓦解。

张乐天教授认为,农业技术的引入会同时受到市场和政府两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改变农村的结构和社会存在方式。农民在技术面前事实上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因为如果把河泥挖出来铺在地里能提高五十斤产量的话,那么喷洒农药和其他技术则可以提高五百斤产量。转基因技术不一定导致小农模式的瓦解。中国农业无法离开现代技术(农药,化肥,实验室种子)。如何看待伴随着大资本的中国没有的技术?适度引进,严格管理,这样也不一定会把农村摧垮。假如新乡土主义是可能的话,那么未来的农民主体是谁?新型农民如何培育出来?

吕新雨教授举出美国转基因大豆打败东北农民的例子用以说明“市场霸权”对中国小农经济的损害。从技术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角度看,种子巨头孟山都(Monsanto Company)的技术为其商业目的服务,遵循的是商业利润目的,并不是为社会服务。这表明:一方面,市场已经变成了霸权,使得我们不得不去吃转基因食品;另一方面,市场与资本主义逻辑霸权合谋,极力摧毁第三世界的传统小农经济,增强其经济依附性。所以,寻找新的市场成为必须,能否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基于消费者权益和人的真实需求,使得城乡更好地互动?也即是要实现摒弃危害不确定的食品,使得人们能自由地选择有机的绿色的食品这一可能。



纳日碧力戈教授指出美国很多居民不接受转基因食品,对商业食品越来越表示怀疑,鼓励在条件允许各自种粮食、养牲畜,自给自足,或者结成城乡互助团体,绕过伴随着高附加值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针对可耕地匮乏的情况,是否可以考虑进一步开发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土地,并且在生产方式上积极发展畜牧业、副业、林业等多种产业。



孙国东博士指出,吕新雨教授对农村和城市关系的理想图景的设立具有某种“立场先行”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会化约中国城乡关系的复杂性。比如说,在缺乏扎实的经验研究的前提下,我们能说城市平民窟的增加与小农经济的萎缩有必然联系吗?即便是有必然关系,让农民住在城市贫民区,还是把农民困在土地上,其可欲性也是可以争辩的。他强调:中国农业何处去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学者应当从学理上深入分析其间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为政府当局的政治决断提供理性依据。同时,关于“市场霸权”的问题,也不可笼统地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等同起来。那些彰显国际市场霸权的数据,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也值得怀疑。



陈润华博士强调自然观随时空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他指出从物种的角度讲,转基因工程是不自然的,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讲,转基因工程是自然的。在传统社会中,农牧副的整体性的小农经济,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在现代社会中,农村仅仅是一个社会部分,农业只是经济的一部分。他还指出:时空观对自然性的影响背后还有一个存亡蓄积的忧虑,一个文化基因遗传的担忧。他追问道:在社会整体性被破坏的情况下,讨论问题的逻辑起点和规则都不再具有自主性,这种对小农

经济模式的回归是否依然是深陷入现代性当中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一主体性的丧失使得问题难以再清晰地被展现出了。他还用寓言和比喻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对文化基因传统的一些想法。



吴冠军教授指出关于转基因技术及其社会影响，文化延续的讨论，其一，技术本身的问题，是科学的问题，应当做实证研究，顶多涉及到个人的表态；其二，技术被商品化的过程是需要被关注的，这里面有人本位，钱本位，注重当下，注重长远等要素需要考虑；其三，这个技术对当下中国有何影响？还原出来一个本然的城乡互助的基于健康需求的市场，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市场。其四，这期间还涉及到对绿色意识形态的反思。西方主流不吃转基因食品，追求 organic food。事实上，商业逻辑同样可以利用 organic food，正如齐泽克指出的商家把捡剩下来的略有腐烂的水平作为 organic food 来卖，获利更多。

林曦博士指出技术完全可能被资本挟持，陷入到了资本的逻辑当中，表达不出社会所要求的中立客观的意见。他认为，我们对科学技术本身是不质疑的，在一点上是过于自信的。应当看到，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科学的基础进行清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追求绿色和原生态的宣传保持警惕，因为两者都有可能掺杂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或尚未发现的可能性在其中。



最后，邓正来教授进行了学术总结。他认为，应当继续关注以下问题：转基因技术和美国大农业的关系是怎样的？中国政府转基因政策的出台和美国政府的游说有何关系？有没有证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略了另外一个向度，也即技术知识内部是有一种力量的，这是促使资本不断运作，甚至使得社会能够不断产生新的意识形态（例如 green、organic 等等）的力量。因为技术，上述的判断成为可能。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弄清楚技术的力量来源于什么地方？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文）

2. 学术名家讲坛：张英进教授主讲“中国电影的跨学科研究”

学术名家讲坛（八）

2010年5月13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学术名家讲坛”第八期迎来了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张英进教授。张英进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电影研究，主要的学术著作有：《多元中国》、《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的建构》、《多中心世界中的中国：中国比较文学论文集》等等。



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主持。首先，顾教授欢迎张英进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学术名家讲坛”演讲，接着他向到场的听众们

介绍了张教授的学术经历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并介绍了本次演讲的两位评论嘉宾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陈犀禾教授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

主讲嘉宾张英进教授发表了题为“华语电影的跨学科研究:民族、跨国与比较的模式”的演讲。

首先,张英进教授对民族电影进行了分析,他主张将民族电影改为“电影的民族性”(the national of a cinema),这样的改变免除了原先概念的单一性、稳定性,使其更为灵活多样。他认为,电影研究领域发生了一系列范式转变:从单一(国家共同意识的神话)到多样(同一民族国家中出现不同电影);从自我认同(区别于好莱坞电影)到自我异化(民族内部的异同);从文本(导演研究)到互文(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研究相联系);从精英(个体作者)到流行(大众观赏),从生产(以制片厂为中心)到融资、发行、放映相结合(以过程为主导)等等。



其次,张英进教授对华语电影进行了界定和反思,指出华语电影研究最近表现出的三种显著变化:(1)从对重要导演和电影运动的传统式研究,转向先前被中国电影史所忽视或排斥的非主流电影实践;(2)对电影作者的主题内容和意识形态分析,转向广义上的“工业研究”,包括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和消费等各个领域;(3)从对民族电影自身的狭隘关注,转向从本土、国家到区域乃至全球的跨国电影的重构。

再次,张英进教授强调了重塑跨国研究的重要性。张教授引用威廉斯区分的三种当代商业叙事电影的类型,对应出华语电影的三种制作,进而追问跨国电影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场域(site)为主的研究逻辑要求电影研究必须作为跨国研究来重新定义,不仅是简单地将全球各种生产、发行、放映和消费来进行链接(这方面在国际关系和劳动力分配方面的研究项目已颇有成就),也应该询问它自身在电影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时的立场。总之,正是由于电影在阐述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人类经验的不均等性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研究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门跨国研究。

复次,张英进教授就“从跨国研究到比较研究”“跨学科性:观众和盗版”“跨媒体性:改编与美学”三个方面谈了个人最近的想法,特别指出在政治经济领域,比较电影研究审核跨国、国家、民营资本间的流通,以及国家在某一时间内可能采取的对外(如好莱坞)的抵抗或顺从的策略;在传播和表达方面,比较电影研究分析不同媒体和技术的特殊性和互联性;在发行、放映和接受方面,比较电影研究探讨电影成交和消费的方法;在美学领域,比较电影研究揭示叙事、场景与音像的结构和功能。比较电影研究之所以优越于跨国性,在于它更能受益于首先在其他学科(如产业研究、媒体研究、文化研究、视觉人类学、城市社会学、比较诗学等)发展起来的范式和方法。

最后,张英进教授总结指出:电影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而这个学科特性历史上不但没有削弱电影研究的繁荣,反而推动了电影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互动,使其成为大学体制和人文学界中发展迅速的学科。因其跨学科的特性,我们在强调电影的艺术特征时,不应抛弃文学、历史、戏剧、美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反,我们应该重视电影研究中长期受到忽视的课题,如表演、

音乐、明星、观众等，这样才能从新的角度挖掘电影跨学科的综合艺术特性，整合电影与艺术、传播、媒体的政治经济体系，更快地发展跨学科的电影研究。

评论嘉宾陈犀禾教授指出，张英进教授的电影研究影响很大，使得该学科在美国能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他主要补充了电影研究的学科发展背景和前景：第一，以电影为代表的视听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当代社会影响巨大，其所具有的跨国性已经日益为学界所重视。第二，电影研究的跨学科性质表现在学科本身的发展历史上，以及近几十年来人文社科等多学科跨学科的互动倾向。第三，电影研究从美学领域跃迁到工商业领域，以及文化视角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特别需要学者们就电影研究中涉及的中西方文化的权利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评论嘉宾吕新雨教授指出，张英进教授今天的演讲从华语电影的界定谈到电影的跨学科性以及比较电影研究，其中的信息量很大，论述清晰明了。吕教授主要提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电影研究中，民族这个概念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民族”的电影时代？电影和国家软实力的构建有什么关系？

“跨民族”问题只有在一个民族国家体系中才存在，而事实上中国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是特殊的，并不是与西方理论恰好对应的。第二，在文本研究中能否摆脱掉民族主义的负担，抑或是揭露出民族主义在当代的各种方式表现，甚或重新发现以非民族主义所表现的种种新面貌？第三，消费主义市场的成功恰恰是依赖于对本土意识形态的迎合，海外资本对红色经典的青睐也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认清意识形态和资本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素材。



张英进教授对上述评论做了简短的回应。他指出，民族性（the national）不一定要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这是需要创作者和评论者在尺度上耐心把握的。一个民族电影所表现的民族性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在此跨学科的框架下，我们便于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此外，跨国资本对新的民族性的塑造也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听众们反响热烈，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少数民族的本土语言译制片是否算是民族电影？民族主义在电影研究中的危害是什么？城市在电影研究中扮演角色的改变是否反映出某种新的动向？如何看待“城市漫游者”这一提法？当今社会主流电影和非主流电影界定的标准有没有变化，理由是什么？等等。张英进教授一一回答了上述提问，指出今天演讲的重点是给出一种电影研究方法，即不把民族主义作为已然建构完成的思想体系，而是退入民族性，成为大家都能够进入商讨建构乃至争论的过程，保持某种未完成的敞开的状态。

主持人顾肃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学术总结，再次对到场的同学和老师表示了感谢。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孙国东、沈映涵等参加了本期讲坛。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文)

3.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陈志明教授主讲“从海外华人研究谈迁移、本土化与交流”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二十八）

2010年5月20日晚上6:3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二十八场主题讲座。

著名人类学家、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前主任陈志明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陈江华教授担任评论嘉宾。



讲座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校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他欢迎了陈志明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 简要介绍了陈志明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 并分别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纳日碧力戈教授和陈江华教授。

陈志明教授本次讲演的题目为“从海外华人研究谈迁移、本土化与交流”。首先, 他指出: 迁移、本土化与交流是相关的。随着迁移和定居就有本土化的过程,



而迁移也带动不同文化和人群的交流。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的历史, 人类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定居下来, 久而久之成为一个地方的人民。就以中国的汉人而言, 今日有些广州人的祖先来自杭州、福州等等, 不是自古以来都是广州的“原住民”。汉人移居海外其实也是自古以来汉人迁徙历史的延续, 而今日中国人已经迁徙到

世界各地, 可以说在世界不同的城市都可以找到华人。

其次, 陈志明教授谈及英文所用的 Chinese diaspora, 认为其应该只指这些还与中国有千丝万缕关系而且还认同中国的新移民。中文学者一般将 diaspora 译为离散或散居, 陈教授则建议译为“流寓”或“寓居”, 进而指出其研究对象一般所说是海外华人, 包括了海外寓居华人和海外本土华人。

再次, 陈志明教授将“本土化”视为移民适应地理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以及其所产生的本土意识。这个过程不仅会影响移民或他们的后代的文化认同, 通过意识的转变也会影响他们的自我甚至族群认同。陈教授举出了马六甲的娘惹(葬礼)、马六甲峇峇的传统婚礼、登嘉楼 Kuala Berang 华人的房子等例子说明海外华人语言和饮食这两方面的文化持续和创造的多姿多彩, 有待学者进一步做研究。

本土化本身也具有多向性, 对之进行的研究将触及多方面的课题, 事实上, 由于本土化而成为华人文化的一部分的文化特征带给华人具有情感的生活习惯。这些华人再迁徙到另外一个国家也会把这些本土化的文化特征带到新的环境。当然他们的后代会在那个新的环境本土化。就是已本土化的华人“回”到中国, 他们也如此。这可从在中国的印尼归侨中体现: 他们喜欢以印尼马来语交谈, 也常做印尼的地方菜肴。

最后, 陈志明教授强调: 当下中国是一个日益壮大的超级大国, 中文的世界的地位也日益被重视。不只其他国家的人们要学中文, 各地的华人也更有机会学

好中文。中国政府也在国外推动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传播，包括办孔子学院，这有如美国在世界各地办林肯中心和英国在世界很多城市开办英国文化协会一样无可厚非。我们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华人能够以普通话交流，这会使他们更加体验到跨国界的华人认同。国籍认同是国家所强加的，在国家入境处显而易见。他强调：我们不是在提出什么世界华人共同认同，而是人类的交流应该超越国家或者族群边界，但语言的不同和民族主义往往使人类强调有边界的认同，而不能走向无边界的认同。

陈志明教授还指出：当下全球化所带来的时空压缩改变了迁移的本质和含义。跨国迁徙已经成为常事，一个家庭的成员可以分布在几个国家而且还可以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这跨国网络的时代我们不止有一个故乡，也可以同时有两个甚至超过两个家乡。21世纪的迁移和跨国寓居已经不像19世纪的离乡背井，而是全球化跨疆界的生活，个人在有适当的条件之下选择在世界不同角落建立家园。

评论嘉宾纳日碧力戈教授指出：其一，陈教授以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实践，熟练运用族群理论，把“观念符号”和“本真现实”紧紧勾连在一起，用小故事讲大道理，这样的话语风格值得我学习。其二，受到全球化经济与现代运输技术的影响，同时在不同国家工作、生活和来往的人越来越多，因此21世纪人们对国家归属也会有较松的看法。目前，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视国家和国民归属为专一的，他们可以同时持有多个国民身份而且不受爱国意识形态所左右。他们可以爱一个国家和社会，但又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爱国。其三，诚如陈教授所指出的，以往研究族群关系较注重群体间或结构性的互动，其实我们也应该研究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而且不妨坚持一种“有族而不唯族”论，跳出民族以更好地看清民族。其四，族群问题的解决尚有待于学界进一步研究，例如在不同国家华人与主流民族的国家整合的程度尽管不一样，其中涉及到公民归属、国家想象、政治经济参与等一系列问题。此外，纳日教授还就“整合”(integration)视角看待族群和认同问题发表了见解。



评论嘉宾张江华教授指出：第一，正如陈志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很多国家都有中国新移民与在地华人合作与分歧的现象。这涉及到的多元认同、再本土化、文化交流等问题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日益重要和复杂，亟待学者深入研究。第二，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华人圈保留较多，而且影响较大，借助其视角来看待和研究中国本身的问题或许将带来新的帮助，这和人类学以前提出的从边疆看中国是比较相像的。第三，张教授通过个人经验指明生命史的某一阶段常常对认同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其中或许有复杂的心理社会原因，此外，他还对承认多重国籍是否引起公民权冲突这一问题谈了一些看法。

陈志明教授对两位嘉宾的点评做出了回应。他指出，其一，族群关系是歧视和政治相关的课题。作为少数群体，华人移民在现今的国家里多多少少还会遇到歧视。早期到美洲的中国苦力工人受尽白人的歧视是与他们的低贱地位和当时的白人工人的经济利益以及主流社会的种族主义有关。其二，认同归属是有情感和

选择性的，并不是寓居海外十几年就会放弃原有的归属。既然是中国人，移居海外并不会使得他们就放弃中国人的感情。况且在现今的世界，国家归属也并不只限于一个国家而已，尽管很多国家还只承认一个国籍。

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观众席反响热烈，主要提出了如下问题：中国语境下的葬礼是否能有笑容，为什么？是否要区分认同和认同的价值？人们对国籍的认同存在许多变化，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归属，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问题将更为复杂，您怎么看？海外华人的中国认同的基础是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移民不同代的人之间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和冲突有什么新的特点？等等。



陈志明教授对观众的提问一一做出了回应。他主要指出，其一，认同是多方面的，在个人方面，如自我认同、性别角色认同；在群体部分，如阶层认同、文化认同等，族群认同是个体可能发展的众多认同之一。其二，海外华人争取利益的方式和策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美国华人是通过与其他少数群体联合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印尼的华人通过报纸、电台等传媒表达自己的声音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陈志明教授的精彩演讲、两位评论嘉宾的深刻点评以及广大同学的积极参与表示了感谢，并对本次讲座做了简要总结。他指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这些有认同困惑的人在生活中真的有问题么？他们的问题究竟是社会价值序列安排的不同，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的不同使得他们采取不同策略的问题还是问题本身的？这背后可能还有一个知识和意识形态建构的问题，到底是那些生命经验本身出现了问题，还是我们做理论研究的人把它变成了问题？这些都引发出了许多问题，是需要我们继续认真思考的。

香港中文大学张展鸿教授、Joseph Bosco 副教授、吴科平助理教授、王丹凝讲师，上海大学巫达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潘天舒副教授以及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刘清平、陈润华、孙国东、沈映涵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文)

4. 复旦文科科研处与高研院举行第十六期“通业青年讲坛”

2010年5月25日(星期二)下午2:30,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联合主办的“通业青年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第十六期学术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刘拥华,上海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哲学博士曾誉铭,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陈润华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教授受邀担任点评嘉宾。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担任本次通业青年讲坛的主持人。高研院研究人员顾肃、沈映涵、孙国东等参加了本次讲坛。许多来自不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生和老师纷纷来到讲坛现场参加讨论。

纳日碧力戈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出席讲坛的讲演嘉宾以及点评嘉宾，对嘉宾和听众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为三位讲演嘉宾颁发了高研院通业青年讲坛讲演嘉宾聘书。



主讲嘉宾刘拥华做了题为《如何理解大转型：从波兰尼与诺斯的分歧谈起》的学术报告，他围绕着如何理解 19 世纪工业革命讨论了新经济史学家诺斯对波兰尼基本观点的一些质疑和批评，梳理了两者在如下五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分析，波兰尼从物质独立、唯物主义、获利倾向的角度来分析工业革命，认为逐利动机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诺斯则指出企业文化等机制对经济动机发挥了制约作用，逐利动机并不占支配地位。第二，关于自我调控的含义，在波兰尼那里，19 世纪后半期对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反抗，或者说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本身是与市场体系不相容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双向运动最终的结局是社会的崩溃。而诺斯意识到，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是与市场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市场体系的运作内在性地要求非市场性方式对市场予以补充，这种补充不外在于市场，更不会导致对市场对社会的威胁。第三，关于分析框架，在波兰尼那里，他的分析框架集中于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三个概念，而诺斯反对市场、互惠和再分配的对立，他通过交易成本的概念使得三者具有连续性。第四，波兰尼对产业革命的分析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诺斯则从制度和组织中寻找产业革命发生的原因，技术是产业革命的后果。第五，关于市场和市场定价，诺斯认为只要有人和需要则市场就会存在，而市场定价的出现需要基本的合理的产权保护和意识形态的支撑。



主讲嘉宾曾誉铭做了题为《“共通生活”的一种可能性：以卢梭思想中人类历史-共通体-心灵机制之“合一性”为基础》的学术报告，主要探讨了卢梭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共通体”-“自我教化”是处理人类自然生活与共通生活的“哲学式”方案。



他主要强调了如下四个要点：其一，卢梭对社会问题的追问以现实政治-社会的领会为前提，将注意力放在“社会”领域，试图追问人们可以普遍接受的社会基础。在面对纯真-虚伪、本真-异化、哲学-政治、个人旨趣-社会习俗的对抗时，卢梭求助于两种解决途径：建构完善的政治社会制度和实施自我德性的教化。其二，曾博士探讨了卢梭的历史观，指出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从心灵机制的角度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自爱-良心-邪恶。在第三个阶段，整个世界的存在以自我为标准，它离人的自然状态最远，这意味着它离自然人性之善也最远。这个阶段的人性已完全堕落，变得邪恶了。这个阶段的冲突体现为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极端对立。对这种对立的揭示似乎预示着卢梭以天才的眼光洞见到了现代社会的穷尽处。其三，关于正当共通体机制及其基础，曾博士指出，正如现实人性总存在恶，一方面，人们并不能完全停留在此种恶中，而忘了上升的必要与可能；另一方面，彻底根除人性之恶既不可能亦无必要，彻底根除恶就意味着根除人之自然存在（如果人们将恶理解为一种自然存在）。反过来，这种正当共通体原则的极难实

现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现实共通体全无办法：革新的可能永远存在。其四，曾博士指出卢梭的诉求在于建立某种透明化的社会，反对古典原则对人天性是社会性的认定，主张遵循直接性和激情，我们的存在是对存在的感受。

主讲嘉宾陈润华做了题为《浅析〈会饮〉与〈易经〉乾卦结构——希腊与中国向上端口之爱智路径与六龙象数》的学术报告，他从大人成就之途径这个角度对两个文本中进行了解读：第一，陈博士指出《易经》从君子利“见”大人，到利“现”大人，也就是如何让自己现出大人（哲人、君子-圣人）之相。《会饮》谈哲人如何理解“神的智慧”，讲如何成就一个大人，一个最伟大的人，在自己内心寻找那种经世致用的关怀。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古代中国和希腊政治哲学的要害之处——古代中国内圣-外王之道，希腊哲人-王之道，俱在这里发端。希腊和中国，理解大人（哲人、君子-圣人），也就是立法者，全是实在，全是一点不虚，踏踏实实。踏实而且了无牵挂——骨子里渗透了一种漂亮的潇洒，都是一种阳刚的、最完美的男性精神形象。第二，陈博士对乾卦何以代表男性精神最完美的形象，何以是古代中国天人关系最为系统最为重要的路径进行了阐述，给出了阳气上出和阴阳相和两种路径：復—臨—泰—大壯—夬—乾；乾—姤—遯—否—觀—剝—坤。第三，陈博士把会饮烘托的苏格拉底精神与乾卦气象做比照，指明会饮当中说话的顺序是：斐德若——泡赛尼阿斯——厄里克西马库斯——阿里斯托芬——阿伽通——苏格拉底，分别是“天真气”、“礼法与习俗”、“自然”、“喜剧诗人”、“悲剧诗人”、“哲人”。最后以酒神形象出场的阿尔喀比亚德“僭主”，（可以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好应了“用九，群龙无首”之相。第四，陈博士强调了学问之于切身体会，反求诸己，发明身心的重要性。他指出西方经典讲的也是中国、是现在。真正起作用，就是讲中国，讲当下，就是讲我们现在的中国，不是讲什么经典。心里不要有什么经典，以为经典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除非你能讲到自己，讲到中国。你讲到现在，讲到中国，它是经典，否则不是。最好是讲到自身身上，讲到这块土地上，讲到自己，其实这是同一个东西。讲到现在、就是讲到中国，就是讲到自己的身心里去。若做不到这一点，如何是在讲经典？如何是在讲中国？如果不是讲到身心里去，说是讲中国，那是假的，那是“佯言”。



在嘉宾讲演结束后，与会学者和听众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主要有：易经中“三”和“四”两个数字不同运用的奥妙是什么？制度对人性的不同要求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德性和社会性，自由和德性是如何相互关联与界定的？自我教化和心灵机制对人的天性的展现有什么作用？符号成本和社会声誉的交换是不是也是一种交换成本呢？与商品交换有何不同？卢梭所言的自我教化是如何实现的？对《会饮》和《易经》乾坤结构进行比照的目的是什么？诺斯和波兰尼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目的并不相同，如何确定比较的合理性？易经中提到的神是什么意思？坤卦精神和老子所言的道如何相通？等等。主讲嘉宾们一一认真回答了学者和听众们的提问，现场讨论相当激烈。

接着，林尚立教授对本期讲坛做了学术点评。他指出：其一，三位演讲人分别讨论了以下根本性的问题，即为什么人类历史会发生根本性的巨变，突然出现工业革命和现代化？以后还会不会发生巨变？人为什么要组成社会？社会对人的意义何在？人如何建构有意义的生命和有意义的成长过程？意义从哪里来？其二，人的建构性是文明的动力和基础。人在不停地认识自己所做的一切，同时也在不停地构想着要做的一切，人所面对的一切均是自身建构起来的。人在宇宙的空间中把握自己，探索自然奥秘，在现实社会中把握自己，创建好的社会，并力图在历史当中把握自己，想象人类的发展前景。其三，林教授继续追问：人的这种建构性是有目的的还是内生的？意识和欲望之间的冲突和互动产生的建构性为什么会产生出历史的巨变？其四，林教授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构成自然，精神的存在构成文化，实践（交往）的存在构成社会，历史（对过去的记忆）的存在构成历史。这四种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生生不息。人类社会的文明成就或许正是人和类的自我发酵的结果。其五，林教授还对这种“自我发酵”（发酵的内生性）进行了探讨，指出我们今天所做的是试图从某个起点来进行解释，从不可知状态抽离出来，或许这仅仅是个循环，而决不可能存在所谓终极的解释。



最后，主持人纳日碧力戈教授再次代表高研院向到场的所有同道，特别是三位讲演嘉宾和点评林尚立教授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通业青年讲坛每月举办一次，每次邀请来自复旦大学以及其他院校的三、四位不同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担任主讲嘉宾，分别做二十分钟的学术报告，然后与会人员进行自由讨论，并由评论嘉宾做学术点评。讲坛旨在打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界限和专业界限，改变学科割裂的、封闭性的研究取向，建立一种开放性的、超越学科分野的学术交流模式。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文）

5. 复旦高研院举办第五期慧园鉴赏会

2010年5月25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办了第五期慧园鉴赏会。本期鉴赏会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主持。

本次鉴赏会以纪录片为主题，选取了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纪录片《中国》作为鉴赏对象。该片拍摄于1972年，正值中国的文革时期。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五个地区（北京、河南林县、南京、苏州、上海）用他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当时的中国。这是一部颇具争议性的纪录片，当年播出后在中国曾引发了一场批判的风潮。本次鉴赏会正是截取了其中关于北京、上海和河南林县的片断进行了重点赏析，重新审视安东尼奥尼这位西方电影大师眼中的中国。





影片看毕，对文革有过切身体验的学者、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学者及广大同学们纷纷提出了自己感触颇深的问题，并围绕下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与讨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文革？安东尼奥尼有没有拍出中国真实的一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中国？意识形态对艺术的狭隘化是否正当？我们又应该怎样来看待“别人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看待记录片这种艺术形式的客观性？等等。通过讨论，大家认为，应该多角度、立体地来反映和看待中国；每个人看待事物都有自身的视角，因而我们对自身的生活经验也要保留反思。

最后，主持人邓正来教授对本次鉴赏会做出了点睛总结。他指出，观看本片应该不仅仅止于了解当时的中国，更重要的是要认识拍纪录片的人的视角，将其与我们自身的视角互动结合，体会不同的视角所带给我们的启发，从而更加客观地来认识中国和周围的世界。

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顾肃、陈润华、孙国东、林曦、沈映涵等也参加了本次慧园鉴赏会。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晨丽/文)

附一:本期活动旨趣简介

慧园鉴赏会(五):纪录片

安东尼奥尼:《中国》

1972年,年近60的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年9月29日—2007年7月30日)以其特有的视角和“日常的方式”纪录了《中国》。这部纪录片当时便引发了一场外交事件和一场批判运动。



晚年的安东尼奥尼曾说,“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

本期慧园鉴赏分为两个部分:(1)首先一起欣赏这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纪录片《中国》(选播电影的部分章节);(2)然后与专家学者一起讨论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中国》。“我们只希望观察这众多的脸、动作和习惯。”“中国的人民,就是这部片子的明星。”(《中国》的旁白)时隔近四十年,我们又怎么来看待这位意大利电影大师眼中的中国人民的脸、动作和习惯?

附二:慧园鉴赏会简介

人生天地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的生命洪流依然环绕并贯穿我们的生活。人之为人,秉承天地之无限厚爱,唯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所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者,所谓独学无友者,所谓格物致知、观风理俗者,皆是要我们把目光投向无穷的远方,把胸怀装下古往今来;对祖先、我们和子孙,对天空、大地和人世,一样的尊重,一样的保持体贴、热爱。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令人回



味无穷的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王家的礼乐教育，印度佛家僧团的讲座修行，希腊雅典学院的演讲辩论；去古未远，尚有村社私塾-书院-太学体系及道观、寺庙等研习智慧之所在，如今则是大学体系。

未来的世界将是什么，取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慧园鉴赏会意在以纪录片、电影、音乐、戏剧等为引子，对所有爱智者开放的论辩和批评，重新理解我们的世界、风俗和意义，学会锻造我们的著作、生命和敬畏。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慧园鉴赏会未来每月将进行一次，欢迎大家前来参加。

三.学术来访

1. 悉尼大学来访复旦高研院

2010年5月17日，悉尼大学政府关系总监 David Morris 和 Hans Hendrichke（杭智科）教授访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双方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01 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座谈。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博士，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研究人员吴冠军博士参加了此次座谈。



纳日碧力戈教授代表大家欢迎两位学者来到复旦高研院，接着林曦博士向外宾逐一介绍了院长邓正来教授，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和其他高研院的成员。成员介绍之后，林曦博士从创院背景、学术理念、学术团队、工作模式、远景规划等几个方面向客人们扼要介绍了高研院的基本情况。



David Morris 从大学行政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了悉尼大学未来几年内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他说目前该校正筹划设立一个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将能够帮助澳洲政府去批判性地来思考与中国有关的事务。

Hans Hendrichke（杭智科）谈到了在研究中国方面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认为必须从一个跨学科的视角来把握中国，而且必须从市场化、全球化和地方化三个层面来把握中国，这样才能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和路径依赖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座谈会上，双方还就今后的合作进行了初步磋商。

2. 莱斯大学访问高研院

2010年5月28日上午，莱斯大学赵廷箴与怀芳亚洲学术研究中心项目副主任韩伯仁（Brian Hammer）博士、人文研究中心（Humanities Research Centre）主任 Caroline Levander 教授和女性、性别和性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Women, Gender and Sexuality）主任 Rosemary Hennessy 教授访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大学讲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研院专职研



究人员林曦博士会见了来访嘉宾并与对方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 2812 室进行了座谈。



林曦博士首先代表高研院欢迎三位客人来到高研院，然后向外宾逐一介绍了院长邓正来教授，副院长郭苏建教授等高研院成员和高研院的创院背景、学术理念、学术团队、工作模式、远景规划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之后，韩伯仁（Brian Hammer）博士介绍了他所在的赵廷箴与怀芳亚洲学术研究中心的发展近况。该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有关亚洲的跨学科研究，其设立的“跨国主义研讨会”（Symposium on Transnationalism），主要致力于亚洲区域的跨国和跨学科研究。

Caroline Levander 教授则介绍了人文研究中心的情况，该中心设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设立之初便立下跨学科人文研究的目标，且经常举办研究员工作坊（Faculty Workshop）、美洲档案合作伙伴关系（Americas Archive Partnership）等等。

Rosemary Hennessy 教授介绍了女性、性别和性研究中心的一些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该中心一直致力于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研究，且通过一些新颖的项目，比如“地方社会运动领袖口述史”等项目，来记录休斯顿和德州本地的社会运动史。

座谈会上双方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四.学术出访

1. 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母校“川外”六十周年校庆活动

当选川外校友总会副会长 做客 60 周年校庆名家学术讲座

2010 年 5 月 2 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应邀回母校四川外语学院（以下简称“川外”）参加六十周年活动。邓正来教授当选为川外校友总会副会长，并做客“60 周年校庆名家学术讲座”，为川外师生带去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研究”的讲座。

5 月 2 日上午，川外隆重举行了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大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发来贺信，外交部部长杨洁篪题词祝贺。邓正来教授作为杰出校友代表在主席台就



座。邓教授 1978-1982 年就读于川外英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5 月 2 日下午，邓正来教授在川外王鲁男副校长的主持下做客“60 周年校庆名家学术讲座”，为川外师生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研究”的讲座。在讲座中，邓教授以全球化和



社会转型为主要背景对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的西方化倾向、学科化倾向、知识地方主义倾向、唯智主义倾向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他呼吁：中国社会科学应当以“中国理想图景”为观照，推进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深度研究，特别是要注重对中国发展中的“生存性智慧”进行探究。

此次校庆期间，邓正来教授还当选为川外校友总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同时获得了川外“突出贡献校友”奖。

2. 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民进中央考察团赴浙江进行“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专题调研

2010年5月7-13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作为学者代表参加民进中央考察团，深入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城市，就“完善制度、落实政策、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进行专题调研。代表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朱永新率领，力图通过了解浙江省近年来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基本情况，分析在推进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更好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作为以教育、文化、出版为主要界别的参政党，中国民主促进会多年来一直关注国家的文化建设，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近年来，民进中央陆续就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社区文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并取得阶段性成果。此次调研活动是一年一度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题考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民进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次具体实践，也是民进文化领域课题研究的延续和深化。

调研期间，考察团听取了浙江省政府、和杭州、宁波、温州三市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总体情况介绍，听取了浙江省文化厅、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有限公司、



浙江国华演艺有限公司、浙江交响乐团、浙江大学动漫研究中心、浙江中南集团卡通影视有限公司、宋城集团、红星文化大厦、杭州杂技总团、杭州爱乐乐团、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乐港科技有限公司等十余家文化单位关于发展文化产业和实施文

化走出去战略的情况汇报，并实地考察了浙江新远集团、浙江出版集团（博库书城）、浙江广电集团、浙江中南卡通影视公司、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浙江京剧团、浙江歌舞剧院、浙江大丰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宁波音王集团、浙江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宁波水木动画设计有限公司十余家文化企事业单位。

作为学者代表，邓正来教授在考察团与浙江相关国有文化单位、民营文化企业负责人和文化研究学者共同举行的座谈会中，做了《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的发言。他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基本背景，邓教授指出，文化走出去不是过去的一般文化交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过去的文化交流误以为是现在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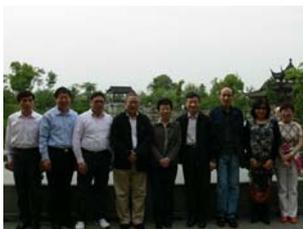
因此如何辨识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我们把握中央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关键。他认为,文化走出去战略出场的背景主要有三个:(1)经济发展,背后的诉求是成为大国,全球治理也需要中国成为大国,不只是经济大国,而且也是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2)全球化时代的世界需要中国发言,于是发什么言成了关键,因此走出去实质上是参与话语权争夺的问题;(3)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根本特征是:经济竞争边界的扩大,会把文化和价值传播出去,尤其是文化产品,饮食产品,生活方式。



关于文化走出去的基本问题,他认为我们需要追问四个问题:为什么要走出?何种文化走出去?如何走出去?面对谁?

他指出:文化走出去战略关系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文化乃一国之本,涉及到价值、思想和理想等超越层面,因此需要我们追问什么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基本思想和理想图景?文化走出去战略预设的是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它的提出事实上蕴含着我们对这3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解释的使命。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向中国自身软实力的建构,即追求一种得到其他文化承认的品格。它是一种举国战略,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需要我们追问我们应该推动什么文化走出去。这种文化须承载有中国当下特色的价值,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因此,只能是文化精品,而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文化精品,而不是一般的文化精品,而不是一般的文化精品。我们还必须追问:以什么方式走出去?面对谁?是海外华人,还是外国人?他主张,我们需要在不同层次推进,实行多元化发展策略。国家一定要抓精品,地方可以多元化。他还指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现在是一般性的、方向性的政策,而不是激励型的政策,如何制定出这样的激励性政策因此是个大问题。

关于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困境,邓教授指出了六个方面的困境:(1)意识形态的标准与文化走出去战略之间的平衡问题(涉及到政治问题,涉及到审批的问题,涉及到问责制的问题,涉及到什么内容的文化可以出去);(2)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平衡问题(包括内容质量的问题,如果只是宣传,而没有深度的分析,会适得其反);(3)文化的范围极广,各个部门参与其间,很难统一协调行动,政策也很难统一落实;(4)当下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历史性缺位(我们现在有的大多是西方的文化,或者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而很少有中国当下的文化精神,也很少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这个问题不解决,西方人还是不了解我们改革的成功故事);(5)文化产业趋利与文化精神价值之间的紧张;(6)激励政策的制定,重点项目的确定与中国权力寻租和权力不受制约的制度安排会存在紧张。



关于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对策,他指出:中国现阶段的特征决定了(1)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路径,必须实行“双轨制”,即国家抓核心文化走出去的重点项目,其他企业和地方以多元方式把各种文化走出去;(2)我们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内部文化的建设,这是文化走出去的基本保障。

据悉,中共中央统战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此次调研给予了大力支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副司长陈英明,文化

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负责人翟德玉，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研究所副所长吕岩梅，民进中央出版与传媒委员会主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李春生，民进中央副主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动漫研究中心主任邓丽丽，民进浙江省委会文化出版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化学院教授胡志毅，民进中央办公厅主任高友东，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部长闻连利等参加调研。

3. 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都市与族群/民族”研讨会

2010年5月17日-18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在上海大学乐乎宾馆参加由上海大学族群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举办的“都市与族群/民族”研讨会，作报告并主持小组会议。他的报告题目是：“中国族群研究者的知识牢笼及其反思”。研讨会旨在讨论都市里的族群/民族相关话题。在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交融背景下，都市的族群/民族现象成为人类学越来越多关注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关注都市空间里的族群、族群关系、文化适应、社会网络及社会组织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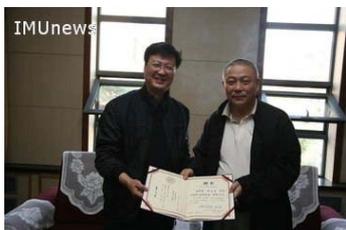


4. 邓正来教授应邀到内蒙古大学讲学

2010年5月21—22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受邀担任内蒙古大学客座教授，并为内蒙古大学师生做了一场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学术讲座。



5月21日下午，内蒙古大学校长陈国庆教授为邓正来教授颁发了客座教授聘书。内蒙古大学党政办主任铁勇教授、人事处处长苏振荣、社科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张志忠教授、法学院院长丁文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理论部主任刘爱华教授、社科处王军等参加了聘请仪式。



当天下午，邓正来教授应邀在内蒙古大学主楼公共管理学院会议室围绕全球化与知识转型、绿色革命与新技术革命的世界影响、创新学术人才培养、教育和学术体制的弊端、人文学科学科建设、创新和发展等问题与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教师进行了座谈。内蒙古大学社科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张志忠教授主持座谈会。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学院等区内高校教师也参加了座谈。

5月22日上午，邓正来教授为内蒙古大学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的专题讲座。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刘丽华教授出席讲座。讲座由内蒙古大学社科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张志忠教授主持。内蒙古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乔旺、法学院院长丁文英教授、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白托娅、校团委副书记（学工处副处长）额尔敦朝鲁、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理论部主任刘爱

华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孙凯教授、社科处王军、区内高校的部分教师和内蒙古大学师生共同聆听了讲座。

在讲座中，邓正来教授从全球化的时代性质、中国改革中的生存性智慧等国际国内背景出发，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现状和发展趋向。他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得以出场的两个背景：其一是社会结构性背景，其二是思想背景。就前者而言，中国自1978年、特别是进入WTO以后开始真正进入“世界结构”之中。邓正来教授说，就中国30年的改革而言，并没有遵循前苏联和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这其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而且也有着中国的生存性智慧，这些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做出自己的解释。邓正来教授还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西方化困境”，即30年来经过“引进”、“复制”和“与国际接轨”等三阶段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西方化倾向”。二是“唯学科化困境”，即由于没看到教学中的传承性知识与研究中的解释性知识之别而在学术研究中趋于“学科导向”，而这种趋向根本没有看到当下转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性”与“共时性”。



5. 邓正来教授应邀到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讲学

2010年5月28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应邀到位于深圳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讲学，为该校师生做了一场题为《国家与社会中的市民社会问题》的讲座。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教育研究与评论》执行主编李庆明教授主持了讲座。



在讲座中，邓正来教授从为何将civil 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谈起，引出市民社会。继而谈到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研究背景：1. 结构性挑战与“活乱”循环 2. 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的论争 3. 市民社会理论对上述问题的论辩。他指出国家与市民社会范式在中国的兴起，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相关论者对这些变化的认识和思考。面对中国的改革情势，中国知识界在进入90年代后便开始了严肃的理论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

关于市民社会的建构理论，邓教授分析：西方的理论有两脉也即是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推演出“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论点，它强调国家对于社会而言只是一种“必要之恶”，因此，对国家进行造反或对抗实是国家违背基本约定时的必要之举；而从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推导出“国家宰制市民社会”的观点，因为它强调国家塑造社会的功能，社会处于被支配的关系之中。而中国特定的时空性带出中国市民社会的提出。从自主



性、参与性、市民性三方面阐述了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含义。强调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性：中国是一个“迟一外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良性互动说”，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

接着，邓教授从“解释能力的局限”、“看不到中国市民社会理论发生学与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以及“看不到中国市民社会市民化”等方面阐述了从中国改革的实践看中国市民社会的局限。并提出要注意问题：（一）如何判断中国市民社会建构、发育、发展的问题。（二）、认清中国市民社会建设中的两个特点共时性与复杂性。



两小时的讲座，邓教授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似醍醐灌顶。讲座后的互动环节，与会师生从“公民的概念”、“小政府，大社会”、“从凯恩斯到哈耶克”一直到现实中的“富士康 13 跳”向邓教授请教，他一一解惑、明晰。

李庆明校长在最后总结时，盛赞邓教授译著、著作等身，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号召大家阅读邓先生、阅读邓先生阐述的新世界。

五.学术会议

1. “东亚协商政治的文化渊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0年5月1-2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与日本涩泽荣一基金会（Shibusawa Ei'ichi Memorial Foundation）主办的“东亚协商政治的文化渊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光华楼东主楼 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

来自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Deakin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Kore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Westminster University, Tokyo University, Keio University, Kyushu University, 以及香港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的 John Keane、John Dryzek 和何包钢教授等二十余知名学者与会。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刘清平、顾肃、孙国东、纳日碧力戈、吴冠军、陈润华、沈映涵、邓正来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他欢迎国内外的各位学者来到复旦大学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并预祝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致辞，他代表复旦大学向到会的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讲，如何将这些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与现代性相适应的思想资源是中

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个主要任务。因此，在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最后，他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成功。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Mark Warren 教授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主办方以及参会学者的感谢，他十分期待听到各位学者对东亚协商政治等相关问题的精彩论述，并预告自己将会在下午的发言中讨论中国政治发展的权威和协商等问题。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做了大会基调发言。在发言中，他强调：在“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研究中、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中，至少应当警惕、反思乃至否弃这样三种倾向：

第一，我们应当否弃对“Deliberative Democracy”做“去语境化的移植倾向”。我们对这个术语的通行翻译具有我们在西学引进中颇为严重的“去语境移植的倾向”。这次会议为了照顾到一些与会学者的习惯，我们将其译为了“协商民主”，但事实上我对这种译名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因为：这样的翻译容易让我们在



“Deliberative Democracy”与中国既有的“政治协商制度”之间建立起来了某种意识形态化的联系，进而遮蔽了我们对“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深入理论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翻译也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本意，特别是它所含有的理性预设。

第二，我们应当否弃在“Deliberative Democracy”研究中的“无理想图景观照的倾向”。邓教授追问在中国语境中，我们研究“Deliberative Democracy”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指出我们必须厘清如下问题：如果我们是为了解决中国所谓的“民主转型”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要完成这样几个前提性的工作：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究竟是怎样的？中国民主的“理想图景”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应该采取何种符合这些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及“理想图景”要求的“民主转型”模式？西方“Deliberative Democracy”究竟要解决西方民主的何种层面的问题？它和建立在竞争性选举基础的“聚合民主”（aggregative democracy）究竟是何种理论承继关系？这种民主符合我们对中国民主“理想图景”的想象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儒文化圈中是否具有适合于“Deliberation”的文化和思想资源？这种文化或思想资源是否仍然存在或可以复活？等等。



第三，我们应当否弃“Deliberative Democracy”研究中的“前反思接受的倾向”。邓正来教授指出在当下包括“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内的所有民主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一直存在着颇为严重的“前反思接受的倾向”，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几乎从不对民主本身进行反思，“民主”

在我们这里成了不用质疑、也无需反思的当然理想。邓教授主张从宪政史或政治神学、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人类民主实践的历史、实践效果等多个向度对“民主”进行反思，强调：现代民主制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和产物，同现代

性一样是建基于科学主义甚或唯智主义之上的，它严重忽视了中国人普遍具有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在政治实践中对政治运行更为重要的影响。

最后，邓教授借用哈耶克的话指出：就中国而言，如果我所谓的“生存性智慧”就是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民之多数所认可的原则”，那么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正视它、研究它。

本次会议共分为四个专题讨论单元：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理论、中国协商政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中国协商政治的当代起源和民主和协商：当下和未来的挑战。在每一单元，会有一位代表做主题发言，然后由两位代表作专题评论，最后是现场提问与交流。



专题讨论单元结束后，来自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大学的 Melissa Williams 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她回顾了上述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指出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方面是试图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特殊性、语境和背景凸显出来，另一方面是为了发掘出中国和东亚的传统及当代政治资源，在充分阐释的基础上，互相参照，进行一些学术性比较的尝试，以期深化我们对东西方不同理论问题的认识并拓宽各自的知识领域。



本次学术研讨会主办方代表 Jun'etsu Komatsu(小松 諄悦)先生在发言中感谢了复旦大学对于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大力支持，并对诸位学者的精彩讨论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他指出本次研讨会作为东亚系列学术研讨会的第一站，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从听众们的热烈反应来看，已经取得了令人喜悦的效果。接着，他回顾了涩泽荣一基金会创始人涩泽荣一先生的经历及其理想，指出基金会旨在通过对全世界范围内哲学研究的经济支持，使得东西方不同的精神传统和哲学思想能得以相互借鉴从而为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的建构做贡献。

据悉，本次学术研讨会上诸位学者的英文论文近期将结集出版。

研讨会议程：<http://www.ias.fudan.edu.cn/News/Detail.aspx?ID=2259>

附：专题单元及发言人名单

1、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Melissa Williams 和 Chikako Endo 教授主持本单元，John Dryzek 和何包钢教授做主题发言，Han Sang-Jin 和 Jane Mansbridge 教授评论。



2、中国协商政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ources of Delibe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sato Kimura 和 Youngmin Kim 教授主持本单元，TAN Sor-hoon 教授做主题发言，陈剩勇教授评论。

3、中国协商政治的当代起源(Contemporary Sources of Delibe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顾肃和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持本单元，Mark Warren、何包钢和 Pitman Potter 教授做主题发言，Leigh Jenco 和 Jun-Hyeok Kwak 教授评论。



4、民主和协商：当下和未来的挑战(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 Challenges Present and Future)

Joseph Wong 和 Terry Nardin 教授主持本单元，Johan Keane 和 Archon Fung 教授做主题发言，Kaori Hayashi 和 Bumsoo Kim 教授评论。



2. “生存性智慧”：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会议议程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

2010 年长三角人类学会议·上海，复旦大学

“生存性智慧”：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 2010 年 6 月 5 - 6 日

2010 年 6 月 5 日（周六）

开幕式

8:00 - 9:00 主持人：纳日碧力戈

致 辞： 8:00 - 8:10

杨志刚（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

主题演讲： 8:10 - 8:40

邓正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题 目： 关于“生存性智慧”的若干问题

集体照相： 8:40 - 9:00

地 点： 复旦大学光华楼前大草坪

主题一：生存性智慧面面观

9:00 - 10:20 主持人：杨志强（每人 10 分钟）

朱剑峰： 中国本土人类学者的“生存性智慧”：人类学知识，知识人类学，以及知识的人类学未来

彭文斌：生存智慧的话语纠葛与困境
张江华：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
巫达：族群和谐与互动策略：从彝文典籍看彝族人的生存性智慧
龙宇晓：中国沅江流域的地方性法律知识再生产、身份认同转型与族群生态格局

自由讨论： 9:50 – 10:20

茶歇： 10: 20 – 10: 40

10:40 – 12:00 主持人：杨正文（每人 10 分钟）

张乐天：生存性智慧、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以浙北农村为例
张 晓：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的“绝对权威”与“充分民主”
杨志强：从“款约”组织看地域社会与民族之间的关系
张佩国 王扬：“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择塘村水务工程中的水权与林权
曹端波：文化与制度：清水江流域侗族木材市场的形成与林业经营模式

自由讨论： 11:30 – 12:00

午餐时间： 12: 10 – 14: 00 地点：复宣酒店三楼 V1 厅

主题二：生存性智慧的理解与阐释

14:00 – 15:40 主持人：张江华（每人 10 分钟）

王铭铭：从心物关系看“生存性智慧”
潘天舒 张梅胤：在“正常”与“非正常”之间：对于上海地区聋人调适性智慧的人类学初探
田兆元：雪神信仰与冰雪生存方式的记忆与意义
尤小菊：塘公祠与旅游公厕——地扞村空间异质性分析
罗正副：实践记忆：全球背景下的地方性知识活动与生存性智慧实践
胡亮：认知模式与移民困境：西南民族地区移民中的生存认知与实践

自由讨论： 15:00 – 15:40

茶歇： 15: 40 – 16: 00

16:00 – 17:40 主持人：田兆元（每人 10 分钟）

萧梅：“阴安阳乐”——巫眼·巫乐·巫路中的宇宙观
高贺杰：森林的智慧

杨清媚： 流动的宇宙观图式——陶云逵关于西双版纳的“双重时间体系”研究之启发

狄金华： 智慧与谋略：乡村社会之中的黑地政治

吴旭： 猪草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吴冠军： 另一种生存性智慧

自由讨论： 17:00 – 17:40

晚宴： 18: 00 – 20: 00 **地点：复宣酒店三楼 V1 厅**

2010 年 6 月 6 日（周日）

主题三：默会知识与多元共生

8:30 – 10:00 主持人：张晓（每人 10 分钟）

赵旭东 齐钊： 费孝通的“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圈说”的比照分析

马成俊： 甘青边界的文明互动：一个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文化个案

王俊敏： 江南传统生态农业文化的修复：理念、重点和难题——以苏州为例

徐则平： 从梯田文化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

张雯： 在巨变的草原上栖居——整体论视野中的蒙古族牧民

自由讨论： 9:20 – 10:00

茶歇： 10: 00 – 10: 20

10:20 – 12:00 主持人：潘天舒（每人 10 分钟）

和少英 吴兴帜： 再地方化：天主教的传播与滇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嬗变

王良范： 小小民族的过关仪式——一个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观察

杨德睿： 在家、回家：冀南民俗宗教对存在意义的追寻

谢燕清： 柔性生存与刚性生存

杨正文： 前现代经济背景下的持续发展观：以清水江流域苗族乡约为分析对象

纳日碧力戈： 民族三元观

自由讨论： 11:20 – 12:00

午餐时间： 12: 10 – 14: 00 **地点：复宣酒店三楼 V1 厅**

主题四：现代与普世观照下的生存性智慧

14:30 – 15:50 主持人：赵旭东（每人 10 分钟）

刘清平： 有关生存智慧研究的若干批判性反思
何茂莉： 民族生态视野与人类情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村落）民间生态
保护智慧的现代转换（当代价值）
何景明： 重塑风景——兼论贵州旅游形象的建构
杨继文： 论生存性智慧的价值基础
孙国东： 生存性智慧：意义与挑战

自由讨论： 15:20 – 15:50

茶歇： 15: 50 – 16: 10

16:10 – 17:30 主持人：张乐天（每人 10 分钟）

顾肃： 天人合一思想与深层生态学中的生存智慧
李德昌： 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及风险社会的应对——势科学视角
沈奕斐： 经验与科学的博弈：当代育儿困境
温宏建： 企业家智慧与企业发展——以 HR 集团为例
董敬畏： 关学与地方社会的德行——关中邓村的考察

自由讨论： 17:00 – 17:30

结束辞： 王铭铭（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
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张晓（贵州大学教授、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办公室主任）

晚宴： 18: 00 – 20: 00 地点：复宣酒店三楼 V1 厅

与会嘉宾名单（按照发言顺序） 杨志刚（复旦大学）

1. 邓正来（复旦大学）
2. 朱剑锋（复旦大学）
3. 彭文斌（西南民族大学）
4. 张江华（上海大学）
5. 巫达（上海大学）
6. 龙宇晓（贵州大学）
7. 张乐天（复旦大学）
8. 张晓（贵州大学）
9. 杨志强（贵州大学）
10. 张佩国（上海大学）
11. 曹端波（贵州大学）
12. 王铭铭（北京大学）
13. 潘天舒（复旦大学）
14.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

15. 尤小菊（贵州大学）
16. 罗正副（贵州大学）
17. 胡亮（河海大学）
18. 萧梅（上海音乐学院）
19. 高贺杰（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
20. 杨清媚（中国社会科学院）
21. 狄金华（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
22. 吴旭（华东师范大学）
23. 吴冠军（复旦大学）
24. 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
25. 马成俊（青海民族大学）
26. 王俊敏（苏州大学）
27. 徐则平（贵州大学）
28. 张雯（上海海洋大学）
29. 和少英（云南民族大学）
30. 王良范（贵州大学）
31. 杨德睿（南京大学）
32. 谢燕清（南京大学）
33. 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
34. 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
35. 刘清平（复旦大学）
36. 何茂莉（贵州大学）
37. 何景明（贵州大学）
38. 杨继文（贵州大学研究生）
39. 孙国东（复旦大学）
40. 顾肃（复旦大学）
41. 李德昌（西安交通大学）
42. 沈奕斐（复旦大学）
43. 温宏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44. 董敬畏（浙江省委党校）